

大家小说

韬奋先生的阅读与信仰

聂震宁

我一直打算写一篇文章介绍韬奋先生的阅读经历。

关于韬奋先生在新闻出版事业上的伟绩和精神风范，我曾经写了一本小书《韬奋精神六讲》做过介绍。可是，关于韬奋先生的阅读，我却不曾专门介绍过。

为什么我要介绍韬奋先生的阅读经历呢？缘由来自韬奋先生的爱女邹嘉骊。一次，我去上海看望邹嘉骊老师，嘉骊老师对我说，韬奋申请入党，那是真正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他的信仰既来自实践，也来自阅读学习。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韬奋读过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是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嘉骊老师讲得深刻透彻，激发了我探寻韬奋先生阅读经历的强烈兴趣。



▲邹韬奋

阅读养成家国情怀

韬奋先生在他的自述《经历》一书中谈到自己早年的阅读。早在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求学时期，他就把《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和唐宋八大家的各个专集（特别是《韩昌黎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重要古代经典，都“完整读过”。曾国藩、胡林翼、曾纪泽的《三名臣书牍》这类书籍更是青年韬奋所爱。他坦言：“我却不是崇拜什么‘名臣’，只觉得这里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达，对于他们处理事务的精明强干，尤其是物色人才和运用人才方面，感到很深的兴趣。”扎实的传统文化知识强化了韬奋先生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韬奋对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具有特别强烈的兴趣。他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欲兼善天下，初非为独善其身计也。”因此，他对大禹、孔子、王阳明等圣贤推崇备至。他认为“大禹，古之圣王也，治滔滔之洪水，拯芸芸之众生，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古之圣人也，挽既溺之世风，传一线之道绪，东亚道德赖其维”，“王阳明，近世之大儒也，悟格物致知之学，倡圣贤良知之旨，振人心之萎靡，惠后进以无穷”。他不空谈爱国，坚持认为国家名誉与国民息息相关，“故爱国者，非爱国而爱国也，乃爱己而爱国也，以吾国之名誉，即吾之名誉也”，“故不爱国者，谓之不爱己焉可也”。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后来从事的新闻出版事业上。



韬奋先生读了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撰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立刻写出读后感《读〈莫斯科印象记〉》，热情推荐此书，并在《生活》周刊上发表，随后即前往拜访胡愈之，并讨论“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各种问题。双方相谈甚欢，意气相投，韬奋当即聘请胡愈之为《生活》周刊特约撰述。

合作之初，胡愈之还不太了解邹韬奋的胆识，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交予邹韬奋。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评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其内部相互间的矛盾，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当时谈其色变的形势下，发表这样的文章，主编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韬奋却一字不改地将其刊登在《生活》周刊1931年的“国庆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韬奋有胆识、有勇气，从此便应韬奋邀约，参加到周刊社的一些重要组织、策划工作中来，并以“伏生”的笔名为《生活》周刊写稿，先后发表了《大众利益和政治》《革命的人生观》《贪污论》《廉洁论》《领袖论》等一文政论文章。这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分析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有的放矢，深受读者欢迎。

正因为“且做且学，且学且做”，韬奋先生在与胡愈之同志写作和出版上的合作中，成为双重受益者，既提高了《生活》周刊的质量，受到读者更热烈的欢迎，自己又作为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读者，获得了阅读和启迪。正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所指出：“在团结广大爱国者、发展进步力量方面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是共产党人对《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帮助。《生活》周刊原来的内容主要是谈论个人修养问题，进行一些‘职业指导’，其政治思想倾向属于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使邹韬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

正因为“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在胡愈之等人的影响下，邹韬奋的思想转变很快。他很注意阅读中外出版的介绍苏联情况的书籍，对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进行研究，并且在《生活》周刊上做了系统介绍。韬奋先生通过坚持不懈的阅读，一

直在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直在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阅读树立革命信仰

1932年12月，韬奋先生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同盟的执行委员。他为救国运动和民主政治尽自己的努力。国民党对此大为恼火，将他列入暗害的黑名单中，迫使他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间出国流亡。邹韬奋出国流亡期间，对欧美社会进行考察，从而成为他思想得到巨大提升的重要机会。首先是对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苏联等国家的考察中，他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看到的是少数人过着奢侈的物质生活，但精神生活异常空虚；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人们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再就是他在英国伦敦的阅读和研究。韬奋先生在海外两年时间，前后3次共有14个半月是在伦敦度过的，他大量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伏案阅读，精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邹嘉骊老师所说的韬奋先生“是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阅读。

我把韬奋先生在伦敦图书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称为“精读”，绝非溢美之词，而是有据可查、有书为证的。最直接证据是他做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回国后，先后发表了《大众利益和政治》《革命的人生观》《贪污论》《廉洁论》《领袖论》等一文政论文章。这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分析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有的放矢，深受读者欢迎。

读到《读书偶译》，我不仅要佩服韬奋先生的阅读之精，更要叹服他的阅读之广、研究之深。我们可以从全书的目录窥其大略。该书的“目次”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凡”“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所受的其他影响”“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的解释”“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经济学”“关于价值论”“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恩格斯的自白”“列宁的时代”“列宁的生平”“列宁的理论”等。邹韬奋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并对革命导师们产生了强烈的爱戴之情，他写道：“革命的思想家的奋斗生涯，常常能给我们以很深的‘灵感’。我每想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无时不心向往之。”读书笔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标志着韬奋先生思想认识的巨大提高和成熟。自此，通过自己丰富的实践和深入的研究，韬奋先生坚定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此后，在美国考察时，韬奋先生与中共留美人士徐永煥谈及自己思想的变化情况，坚定地表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两条路，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获救。而且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他们还讨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出国时，韬奋先生“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归国时，他不仅具有在国内生活斗争中的深切体会，还获得了不同社会考察的深刻认识，更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从而明确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他激情写道：“时代的巨轮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着，只能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线路，没有什么中立的余地了。”至此，韬奋先生已经从家国情怀、探寻救国救民道路踏上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征途。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人生 撷英

2022年1月，91岁的老安走了。听到消息，我内心难以平静。老安是参与《人民中国》创办的元老级人物，她毕生从事对日传播工作，见证了一份外宣期刊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过程，见证了中日关系从民到官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老安的离世，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老安那一代外宣人的奋斗故事不应被遗忘。今天，我们在努力创新叙事，讲好中国故事，其实，老安的故事就是一段令人感慨的中国好故事。

老安是和曾经共事的同事们的亲切称谓，我1989年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就在老安分管的翻译部工作，经常得到老安的身传言身教，并目睹了老安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那一代人独有的高贵与优雅。中日同事更直称这位毫无架子的副总编辑为安桑。

1930年出生于大连的老安，祖籍山东烟台，全名安淑渠，讲一口浓重胶东口音的普通话。据和老安同批于1952年由大连调任北京筹建日文版《人民中国》的刘德有先生回忆，“老安的父亲在大连开有一家茶叶庄。老安小学上的是日本人在大连经营的小学校，毕业后进入初高中在一起的大连神明女子高等学校，读到三年级时，日本投降，学校关闭。1945年光复后大连即告解放，老安转上‘文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日报社当记者。”1952年，老安和刘德有等四位大连年轻人被《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始人康大川选中，调来北京。

2009年第六期《人民中国》纪念中国外文局建局60周年的特辑中，收有一篇老安撰写的文章。老安在文中深情地回忆了《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办人康大川率领大家艰苦创业的轶事。文中用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55年以外宣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时，康大川和安淑渠也同行前往，作为译员的安淑渠陪同康大川等人访问岩波书店。那时候，日文版《人民中国》刚刚两岁，康大川和安淑渠也都风华正茂。另一张照片，老安和前副总编辑丘桓兴在翻阅相册，回忆和康大川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老丘和老安同月因病离世。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年份里，在明年即将迎来《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70周年的时候，两位重量级前辈的相继离世令人唏嘘。

1952年，安淑渠进入《人民中国》的时候刚刚22岁，起初的工作是做美编，具体工作是画版样、排版、找插图和照片，也兼做校对。在上面提到的回忆文章里，安淑渠写道创刊号诞生时的兴奋与不安，“经过两期试刊，飘散着墨香的《人民中国》日文版正式刊出了。就在大家正要举杯庆贺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道：‘等等！’原来一篇文章中的人名印错了。当时是铅活字排版，修改错字要用刀在印好的杂志上刮去错字，再用正确的铅活字像盖章一样一个个加印在修改处。大家一起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改正了每一本的错误。从那以后，‘要心中想着读者，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成了翻译校对组的座右铭。”

在人才济济、业务气氛浓厚的办刊环境里，在多次随代表团走出去针对日本民众开展民间交往的活动中，安淑渠在共和国的青春岁月里不仅成为编排校对的好手，也迅速成长为出色的口译翻译。

1955年那一次出访，是安淑渠第一次作为译员随团访日，同行的译员还有刘德有。访日期间康大川访问了岩波书店，对日本图书出版业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据刘德有先生回忆，这张康大川、刘德有、安淑渠三人同框的珍贵照片拍摄于帝都饭店屋顶，从那里可以望见皇宫和城壕。

1955年8月，在日本举办了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与核讹诈，刘宁一以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代表的身份率团访

日，安淑渠作为译员前往。该团在日本发出中国人民的声音，与核武器受害者深入交流，同时广交各界朋友，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铺垫性工作。

1963年11月5日至12月3日为期近一个月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第四次访日活动，安淑渠作为译员随行，留下较多生动而珍贵的照片。这一年的2月，廖承志对《人民中国》提出了调整办刊定位，加大文化内容，扩大读者对象的要求。6月，为纪念《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当时的外文出版社访日团赴日广泛听取读者、发行者和日本作者等各界意见，为调整编辑方针，加大社会、文化、人民生活方面内的报道内容做了扎实的调研论证。而年底的作家代表团访日，正是从活动层面体现了当时国家加大对日文化交流力度的举措。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与日本作家的交流可谓推心置腹，从现存的照片上就能够感受那种真挚坦诚的气氛。这次出访为两国民众的民心相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民到官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努力，终于在1972年见到曙光。这年9月间，安淑渠被借调到外交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待班子，并被任命为笔译组组长，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时刻。据老安生前回忆说，当时因出身问题下放到农村的母亲病重，而她因重要工作在身，无法离开陪伴母亲并为母亲送终，这件事令她抱憾终生。感到欣慰的是，在大家的努力下，争取多年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得以实现。

1974年2月28日至3月26日，老安再次被借调全程陪同日本女科学家代表团访问北京、广州。近一个月相处在一起，女科学家们深深被老安的周到热情和高品质的翻译所折服，日后特地联名致信表示感谢。当时邓小平复出整整一年，国家正在对科学教育进行整顿，一年后周恩来同志将重提“四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京接见了日本女科学家代表团，老安作为随团译员，为邓小平同志做翻译。这件事情成为《人民中国》引以为荣的话题，直到我入社后还经常被谈起。一次工作之余聊天，我好奇地问老安：您的日语水平绝对没有问题，可您那浓重的胶东口音和邓小平同志浓重的四川口音之间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吗？老安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么一说，她回忆了一下表示，整个交流确实很顺畅，没受口音影响。一是邓小平同志说话条理很清楚，易于辨识；二是邓小平同志见识广，与五湖四海的干部打交道，胶东口音也听得懂吧？

成为副总编以后，老安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特别重视和读者、顾问交心，每当有重要客人或读者团来访她都和其他社领导热情座谈，虚心请教，交换意见，并据此改进服务与工作。

每当读者来访，老安总是热心安排接待。有一年国庆节假期，一位读者来社里造访，老安亲自出面接待，与之深入交流，还安排当时住单身公寓的我陪同这位读者参观休息日的北京。得知是牺牲节假日休息安排的，这位突然造访的读者非常感动，一方面为自己的唐突表示不安，一方面对人民中国的周到接待感谢不已。接待工作结束后，老安觉得耽误了我假期休息，还专叫到她家做寿司饭犒劳我。水原明窗、神官寺敬夫妇、胜田弘、林谦三、白鸟良香、西野长治等日本各地读者会的代表人物与普通会员……很多老读者就是冲着老安这样的人脉魅力和《人民中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

我进入《人民中国》时，老安已经接近离休的年龄。尽管在老安领导下工作不过短短三年多，但耳濡目染下，不仅学到了很有用的知识和方法，更是在工作作风上受到老前辈的洗礼，受用终生。《人民中国》的标题讨论会是以翻译部为主体，中日同

老安的故事

王众一



▲安淑渠

事全程用日语讨论的业务环节，对于培养跨文化意识，使翻译更加贴近受众意义重大。有老安参加，会议气氛就格外活跃。讨论引发头脑风暴，一个个生动的标题就确定下来了。如今这个传统在《人民中国》继续得到传承。

1993年《人民中国》创刊40周年，因为工作需要延长离休年限的老安也迎来光荣离休的时刻。当时正在负责“导游手册上找不到的北京景点”栏目的策划与采编的我突发奇想，提出做一期《人民中国》发祥地的特别报道。老安非常支持这个想法。也许是在结束职业生涯之际想重访自己当年起步的地点，也许是为了对我这个年轻人做一次传统教育，老安决定带我一起前去于新华通讯社内的国会街采访。到了国会街，看到当年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老安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创业时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以访谈的方式完成了这篇文章。日文成稿后请老安审阅，返回的底稿留下了老安用红笔认真修改的痕迹。这份修改稿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人民中国》几次搬家之后遍寻无踪，至今仍感遗憾。

创刊40周年的纪念招待会在西苑饭店隆重举行，大批日本读者和同业组团前来祝贺，老安在这一刻和老朋友相聚，一道回忆起愉快的往事。在招待会上，杨正泉局长向老安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她毕生为人民友好和国际传播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离休以后的近30年里，老安仍然关心着《人民中国》的发展，她在工作遇到什么难处也愿意向老安求教问策。许多老读者依然记着老安，每次工作访日见到老读者，都有人问起老安的近况。70周年国庆时，老安在电视上看到我接受采访讲述老读者神官寺敬夫妇与中国的情缘，通过微信发来她拍下的截屏照片，表示欣慰。老安的晚年和女儿在一起，生活是平静的。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老安应该是幸福的。她伴随着共和国的青春脚步，和一群有情怀的人一起将一本杂志做成中日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桥梁；她见证了中日关系在战后艰难起步，通过以民促官，官民互动，一步步迎来邦交正常化，并在中日关系相对最好的时候光荣离休。

老安的故事让我们思考什么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初心所在。她那一代人所独有的纯粹性、使命感、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守正创新，传承国际传播优良传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觉得老安并没有离我们而去，她仍在守望着我们，守望着她所为之奉献一生的《人民中国》和外文局的事业与未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



▲1963年，安淑渠（左）随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访日。